

法兰克福学派对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批判发展的启示

李念

摘要: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已经有80年的发展历史。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的发展对中国当代大众文化批判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强调要在实际语境里发展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要接受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所谓“中心”和“边缘”位置的置换;在实际操作中,不论学者、大众还是国家都要重视市场和媒介的作用。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中国大众文化批判发展;启示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999(2012)09-0144-03

作者简介:李念(1987-),女,广西桂平人,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桂林 541004)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大众文化。

收稿日期:2012-02-27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批判和文化研究占据了西方文化界和文论界的中心位置。这股思潮也深深影响了我国的理论界,发生在90年代的人文精神讨论、大众文化讨论、文化研究讨论就是我国理论界对这股逐渐蔓延于全世界的文化批判与文化研究热潮的自觉回应。大众文化研究是整个文化研究与文化批判的重要课题。纵观当代西方世界,其研究领域已经扩大到了包括电视、电影、广播、流行歌曲、服饰、时尚设计、怪异现象等一切非精英文化乃至亚文化领域之中,其中,大众文化是文化研究的主要对象;同样,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是当代大众文化批判的理论源头及重要理论基础。这两点在我国学术界已经有基本共识。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作为一个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其优缺都已经被众多学者所看到。

一、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发展

法兰克福学派的开始形成是以1930年马克斯·霍克海默就任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所长为标志。整个30年代是法兰克福学派奠定自己的理论基调的时代,其独特的批判理论开始形成。同时,30年代也是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的发端时期,如阿多诺的《论音乐的社会情景》等批判大众文化的经典之作就是在这时期发表的。

40年代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重大发展时期,大众文化批判和集权主义批判成为其两大研究主题。在大众文化批判上,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从纳粹统治的德国转移到了据称是自由和民主的美国。他们看到了大众文化和权威主义之间的关系,在美国那样

一个商业化和工业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中,大众文化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无所不在的程度,几乎是对大众进行欺骗、说教、驯化等意识形态的控制。于是,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对美国社会的大众文化展开了激烈的批判,并且明确使用了“大众文化”(mass culture)一词。他们的最高成就集中于《启蒙辩证法》中的《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一章中,对文化工业的非文化性和非大众性都进行了详细的批判。

50年代开始出现“法兰克福学派”的名称。6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逐渐在学术界获得重视,并享有世界声誉。在繁荣昌盛的五六十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继续对大众文化展开批判,如阿多诺的《电视和大众文化模式》《诸星落地:〈洛杉矶时报〉的“占星术栏”》《音乐社会学导论》《电影的透明性》《论闲暇》等著作;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单向度的人》《对不幸意识的征服:压抑的反升华》等都见证了他们的理论发展和转变。

历史似乎都是有起伏的,盛极往往会转衰,在第二代理论家们那里,由于种种原因,至70年代,哈贝马斯等已经很少甚至放弃了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如今的第三代理论家中,值得一提的霍耐特则是在对第一代和第二代的批判模式进行批判中成长^[1]。

二、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在中国的境遇

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进入中国的时间并不长,正式登陆我国的时间应该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文革”的结束和各学术界得到思想解放,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开始逐渐被介绍到我国。原因有二:首先,该理论在当时的西方已经产

生了相当广泛而且深刻的影响,能够被当成了不起的当代西方学术传入他国;其次,作为始终以经典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中国,对于与其有相关性的理论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在当时百废待兴的中国,这对于捍卫马克思主义和反思并发展马克思主义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在整个8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只是作为一种被一并带入的理论,并没有得到相当的重视,而且几乎只有马尔库塞被大家所认识。

直到90年代之后,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才真正被我国的学术界重视。这主要是基于中国自身的大众文化的迅猛发展,以及本土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空白。随着我国商业化和世俗化程度的日渐加深,商业性的大众文化已经渐成规模。本土化的大众文化的兴起必然引起理论界对这个现象的反思,而没有找到相应的本土理论依据的国人自然而然地就会在国外盛行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中寻找并应用作为其依托。但是,我们发现其后果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能做的仅仅是拿来就用,对理论本身缺乏批判的眼光,对理论是否适合我国本土的大众文化状况的分析也缺乏自觉的反思。

到1995年,应有的反思和批判态度才开始在一些学者身上发生。这是理论自身发展所必须要走的道路。大众文化作为一种长期存在并仍在迅速发展的事物,我们不得不在正视它的存在的同时还要做出更具有力量的批判。同时要说明的是,我国的旅美学者徐贲的两篇著名的文章《美学·艺术·大众文化——评当前大众文化批评的审美主义倾向》和《影视观众理论和大众文化批评》的发表使国内反思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氛围开始浓厚起来。他们开始转变态度,不再是一味地“挪用”,而是考虑别人的理论是否合适我们自己的文化,比如陶东风、金元浦等人。学术界提出了一个最主要的观点: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与中国的经验事实之间存在着错位^[222],即所谓的“错位说”。这样的错位在郝建的《大众文化面对法兰克福学派》一文中被归结为三:不同时代不同大众文化格局的错位,社会结构的错位和文化的错位。当然,也有持反对意见的,如姚文放、童庆炳等,他们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并没有过时,错位并不存在,在当下仍然适用于中国。

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和深入,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和法国的罗兰·巴特开创的带有法国享乐主义色彩的符号学式解读谱系都又发展出了新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逐渐开始受到冷落,可是不能否认的是我们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还是在继续着。

三、对我国当代大众文化批判的发展启示

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在我国命运变迁就已经可以充分展示出我国学术界对该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意义和价值的认识,它给予我们的启示良多。我们知道,从来就不可能有一种批判理论是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同样如此。从它诞生的那天开始,它就已经存在着局限性,中国不可能不加反思地直接运用这些作为大众文化的批判工具。但是,作为一种对当代学术影响深远的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不仅仅在它所处的年代有着较大的合理性,而且对于我们今天中国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特别是在于大众文化的研究和批评上依然有着重大的理论借鉴意义:

(一)在实际语境中发展大众文化批判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是其整个社会批判理论中的一部分,该派在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的同时更多关注的是理论的逻辑力量而不是理论对现实的应对。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在《通俗文化理论导论》一书中这样写道:“法兰克福学派通常因为两个特别的缺点而被人挑出来:他没有为自己的理论提供经验上的证据;用来表达其观念的语言晦涩艰深。根据我对阿多诺的论点的概述,他显然很少做出努力从经验上来论证他所提出的主张。”^[385]其实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一开始就存在着局限是和他们脱离实践密不可分的,比如他们以批判德国纳粹社会的态度来批判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他们认为走向单质性和一体化的文化就不可能存在有分化和差异的文化,始终对社会充满了悲观失望的情绪。这是他们在自己的独特语境中形成的观念,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我们也要充分认识到任何发展着的事物都不可能是纯粹绝对化和单一化的。要看到一体化和分化并存,同一和差异并存,独裁和自由并存。会有人在其中成为单向度的人,但是同样会有人走相反的路,压迫之下不仅仅会产生屈服,也同样会有反抗。在我们自己的大众文化批判中不可能忽视现实经验的力量。

在20世纪9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是被我们的学者拿来就用的,如:陶东风的《欲望与沉沦——大众文化批判》、金元浦的《试论当代的文化工业》、张汝伦的《论大众文化》《大众文化霸权与文化生态危机》、尹鸿的《大众文化时代的批判意识》《为人文精神守望: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批评导论》、王彬彬的《两种不同质地的文化——略论“通俗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区别》^[224]等等。但我们注意到今天国内有如童庆炳、王一川、赵勇等众多学者仍然有所继承并不断争鸣于大众文化批判领域。我们需要的是从

现实经验出发而非仅从哲学理论出发,在实际语境中发展大众文化批判理论。

(二)接受“中心”和“边缘”位置的置换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文化是借助现代经济、技术力量发展壮大以至于渗透到了普通大众的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它的流行使得传统文化艺术望尘莫及,但是它也使自己的大众性和文化性大大丧失。现代经济和现代科技促使了大众文化的流行,也使得大众文化变成缺乏个性和风格的标准化的文化商品,没有了自身的特殊性和超越性。作为以赚钱为目的的文化快餐,它使得人们的想象和思考变得虚弱不堪,加重了大众的认同和顺从,所以它最终成为了反大众的文化。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们基本上都对大众文化报以反对的态度,作为知识分子的他们始终不能走出片面和绝对化的认识观。

在中国,虽然与法兰克福学派当时的语境大不相同,但大众文化在90年代中国的入场式,决定了它的尴尬身份。无论是精英主义式地将大众文化视为文化垃圾,还是后现代主义式地为大众文化大声叫好,大众文化常常被看作是一种与知识分子文化传统相对的形态,而未曾引入真正革命性的对于“文化”的反思。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大众文化仍旧与高雅文化“井水不犯河水”,即精英主义式的批判内在地将大众文化置于文化等级中的次一等位置,而后现代主义式的欢呼则不过是把传统的文化等级颠倒过来,文化等级秩序依然故我^[4]。

事实确实如此,时至今日,我国的大众文化的商业化和产业化程度都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传统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社会身份及其精英意识使得他们的创造即使涉足到了大众文化也始终保有一定的艺术水准。他们的心理习惯使得他们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不屑于制作纯商品性的“文化垃圾”。但事实是在90年代之后的很长时间内,大众文化无疑成为了中国文化舞台上的主角。其实,为什么一定要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分得如此明确,在商业性的当代社会根本是不现实的,所谓的“中心”和“边缘”两者之间的界限只能更加模糊!很多例子都可以说明问题,有些电视剧,比如87版《红楼梦》的热播曾经吸引的不仅是千家万户的普通大众,同样也包括相当数量的文化精英们。而那些曾经在出现时被定义为通俗文学、大众文化的东西,如《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今天不也成为了文化经典吗?因为我国国人的知识水平相对不高,要照顾到受众的接受水平,大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承载着启蒙大众和提升大众的功能。而高雅文化的实现基础一样是要得到大众接受,从大众身上得到回报才能有其存在的意义,没有市场取向是很难

存活下来的。

大众文化不是没有文化艺术性,大众文化不是没有为大众服务的性质,大众文化是值得我们接受的。我们在跟随文化发展潮流的同时也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毕竟我国当前的大众文化领域中,确实是有观念落后、趣味低下的文化产品像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那样正在毒害和侵蚀着大众的思想。

(三)重视市场和媒介

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在技术通过制造消费品对大众实施的控制中,文化工业产品比一般的生活消费品具有更大的控制能力,因为大众文化的产品比一般的消费品更具有娱乐性,更能适应大众的消费心理。这一事实告诉我们的是在接受大众文化的同时还必须警惕在大众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不利行为。我们不妨看看“超女”、“快男”、“我型我秀”等选秀活动的影响力,不妨看看近十年贺岁大片、商业大片的影响力,不妨看看《非诚勿扰》《我们约会吧》等相亲节目的影响力,通过电视、电影、网络、书刊等媒介传递出来的大众文化信息在中青年中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人对这些现象的大肆评论。有一个鲜活的例子:2010年,张艺谋导演似乎一反常态地拍了个文艺得不能再文艺的《山楂树之恋》,火了两三位年轻演员,痴了无数的男女同胞,引了“山楂树现象”,填了多少年来已经被都市爱情统治的电影市场空白,最主要的是张导又大赚了一把!其实是小说《山楂树之恋》最先打开消费市场的。谁人不说这故事表现的是史上最干净的爱情?张导在几个导演的斗法中抢到了电影的改编权。而后在影片上映前的造势更是花足功夫,连王蒙、刘心武、苏童这些精英层次的大家都给予了相当高的推荐的评论。刘心武说:“把这部作品与30年前的‘伤痕文学’联系起来不无道理,但它具有当下性:极端环境下的性爱压抑被‘现在我们’打量,会产生出比反思更丰富的憬悟。”作为第15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开幕电影的《山楂树之恋》,张导却放弃了去参加威尼斯电影节,目的直指国内市场,没有必要去为了走红地毯而打乱在国内的宣传。作为国内第五代大导演中的佼佼者,张艺谋看到了市场,抓住了已经被大众肯定接受的电影方式,在给观众以故事的感动和历史的回味的背后,导演也实现了其商业利益。

在所有的例子当中,我们提到的似乎都是文化者本身,而没有明确加入国家这个政府的干预。其实国家的干预时时存在。我们不能否认这样的结果当中也包括了主流意识的渗入和一定程度上的操控,但是没有和谐的文化环境是不可能良性发展着的大众文化的,而大众文化批判的有序进行也是离不开整个国

(下转第164页)

策的宣传力度,使毕业生知晓政策、用好政策。就业指导老师要耐心细致地做好毕业生就业政策咨询工作,及时帮助学生解决求职创业中遇到的问题。为了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创业观,培养学生积极健康的创业意识,学校应加强大学生的创业培训,如:创业风控意识培训、创业团队的组建与职能分工技能培训、创业基本财务知识与法律知识培训等各种培训,来提高大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心理承受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社会适应能力和规避风险能力。

四是引导毕业生创业,为大学生成才另辟蹊径。所谓自主创业,是指劳动者主要依靠自己的资本、资源、信息、技术、经验以及其他因素自己创办实业,解决就业问题。它是市场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迅速发展壮大的产物,现如今民营经济是中国经济增长最为

活跃的力量和源泉。自主创业已成为了平民创业、学生创业,中国进入了“创业者”的时代。鼓励大学毕业生创业是激发大学毕业生创意与创业激情,缓解就业压力,拓展就业渠道的重要捷径,也可为将来涌现一批高素质的企业家和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 [1] 安身健.大学生全程化就业指导教程[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
- [2] 肖绍俊.高校学生全程化就业指导新论[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
- [3] 马刚.基于人本主义的职业倾向测评系统的研究与实现[D].天津师范大学,2008.
- [4] 王本贤.浅谈大学生职业生涯设计[J].教育与职业,2003(13).

(上接第 146 页)

家的文化建设。加强文化建设,发展文化产业,关注文化市场和传媒的发展是当代每一个国家都面临的重大任务之一。

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在中国的命运还会如何发展我们不能肯定,但是,当面对大众文化如火如荼发展着的文化市场时,我们首先能够想到的肯定是法兰克福学派。该派剖析大众文化的思路和方法依然是我们思考大众文化的重要参考依据,其对我国的大众文化批判的启示也不仅仅只是上面提到的三点,还有诸如克服文化拜物主义、主旋律在大众文化中的参与程度、是否应当采用以关注大众命运的

民众作为大众文化的立场等等。当然,我们也不可能忽视对英国的“文化研究”和法国的符号学方法的研究和采用,只有在有所鉴别的基础上,才可能做好本国的大众文化批判工作。

参考文献:

- [1] 王晓生.为个性自由而斗争:法兰克福学派社会历史理论评述[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 [2] 尤战生.流行的代价: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
- [3] 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通俗文化理论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 [4] 贺桂梅.“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大众文化研究的实践和可能性[J].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1(3).

(上接第 148 页)

已回国的何炳松就不遗余力地倡导美国新史学理论和方法,尤其是上述提到的鲁滨逊系统提出的理论,由他翻译的《新史学》于 1924 年由商务印书馆推出,曾被二三十年代国内许多大学历史系采用为讲授历史研究法的教材,被誉为中国“新史学派的领袖”^[2]。此外,何炳松教授还同时介绍了与“新史学”持相近学术观点的学者的学术思想,以供互相印证和借鉴。这方面一个突出的例证就是在 1926 年,他亲自翻译了当时极具影响的一部书即美国亨利·约翰生的《历史教学法》,作者亨利·约翰生的史学观点倾向于“新史学”的一派,“书中的主要论点与其很为近似:即“主张

进化,主张今古的不同,反对以历史为褒贬或者作殷鉴的工具,反对专去记忆事实等等。”^[2]

尽管西方史学理论部分和中国传统史学理论部分仍处于脱节状态,但其影响在总体上是积极地,且 30 年代是中国史学界引入西方新思想、新方法的活跃期,史学工作者从其中不断地寻找吸收适合中国史学研究的道路,新史学运动虽然未能最终获得这一地位,但它扮演的用新思维开阔史学研究领域的角色则对中国史学探寻之路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 [1] 鲁滨逊.新史学[M].齐思和,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67.
- [2] 卢绍稷.史学概要[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